

关注

心系读者大众，欲与先锋试比高

——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理由

□赵勇

路遥是特别希望能与大众读者进行交流的小说家。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就已意识到：“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选择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当《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新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非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起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种窥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新，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如此看来，自始至终关注读者大众或大众读者，是路遥写作的秘密武器，也是《平凡的世界》能够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人生圣经”的致胜法宝。同时，一旦他把读者大众挂在嘴边，放在心上，也就与现代主义构成了某种真切的对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会兴起，其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大众的恐慌，因此，现代主义往往是和拒绝读者大众捆绑在一起的。约翰·凯里指出：从尼采开始，欧洲的知识分子就感到了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威胁，“因此，想想大众将灭绝和绝育，或者否认大众是真正的人，这都是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虚构的避难方法。更激烈、更实际的避难方法则是如下的建议：“阻止大众学习阅读，以使知识分子重新控制用文字记录的文化”。（《知识分子与大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然而，这种阻止并未成功，因为实际情况是，当教育改革大功告成之后，识字断字者迅速增多，于是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庞大的阅读人群。为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大众报纸开始出现，书商们也开始改弦更张，甚至连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也“清醒地决定为百万大众创作”。知识精英眼瞅着无法阻止大众阅读的热情，便只好在文学的“怎么写”上下功夫。于是，“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手段。而被称为“现代主义”的这场运动“不仅变革了文学，还变革了视觉艺术。它既抛弃了那种据说为大众所欣赏的现实主义，也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凯里进而指出，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便是阻止大众阅读的代表性之作。小说虽塑造了大众代表利奥波德·布鲁姆，“但事实上，布鲁姆本人永远也不会，也不可能读《尤利西斯》或《尤利西斯》这样的书，因为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它的先锋派手法以及它的晦涩，都使布鲁姆之流被严厉地逐出其读者群之外。20世纪没有一本小说像它那样，仅仅为知识分子写作”。

凯里的分析让我们意识到，姑且不论现实主义的内容如何，至少现实主义的形式是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因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既不可能玩魔幻，也不可能意识流，它们往往有一个线性的时间框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书中人物开始登场亮相，随即便展开自己的故事；而故事的走向也遵循着序幕、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逻辑。由于这种结构框架高度等同于现实生活，普通读者进入其中就不会有不适感或违和感。因此，一般情况下，现实主义文学中不可能有“元叙述”或“作者闯入”，自然也不会有“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之类的先锋叙事。

如此看来，是因为路遥对读者大众的高度重视，才让他有了选择现实主义的巨大动力？是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么说并不全面，因为除此之外，与现代主义较劲，欲与先锋试比高，也可以成为考察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一个角度。

众所周知，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坛是先锋文学横空出世的年代。那时候，马原玩着叙事圈套，余华写得血呼啦黄，洪峰在《奔丧》，莫言正《爆炸》。而现实主义在人们心中仿佛已是明日黄花，真有点“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的意思。而在这种文学形势下，路遥要与现实主义为伍，可见其压力之大。但种种资料表明，“个性非常强”的路遥，其性格中有一种不服气、不认输的东西。陈忠实曾经披露过一个细节，1985年3月，他与路遥共赴河北涿县，参加中国作协在那里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会上会下，先锋文学与先锋派的创作理论已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忠实解释，澳大利亚羊是当时刚刚引进过来的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大力推广。路遥以此作比，隐喻的是正在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文学，却把自己崇尚并实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归类为陕北农民养育的山羊。于是，路遥的信念和口吻甚至也让陈忠实倍感提气。

另一个细节是，当《平凡的世界》终于写完，评论家蔡葵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后，路遥很激动，并在给蔡葵的信中如此写道：“您应该看得出来，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冷静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已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很显然，无论是以澳大利亚羊隐喻，还是以西式餐具作比，路遥无疑都指向了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其较劲之心跃然纸上。而为了写出《平凡的世界》，路遥光是前期准备就足以让人震撼：读长篇名著，悉心揣摩现实主义大师的写作技巧；翻五种报纸，直到对1975—1985年每天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让生活“重新到位”，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四处奔波，凡此种种，当然可以解释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但也是准备较劲的必然举措。而在写作过程中，他之所以“把笔磨秃了写”“不惜缩着身子用‘矮步’行走”，固然是“担心诙谐、轻快的语言对整个小说的浑厚大气造成伤害，整成‘顺口溜版的《战争与和平》”（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但在我看来，其中依然有较劲的成分。说得极端一些，假如不较劲，《平凡的世界》或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因此，一边想着读者大众，一边要与现代主义较劲，很可能这就是路遥选择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作聚焦

徐剑长篇报告文学《西藏妈妈》：

深情的土地 善良的人民

□张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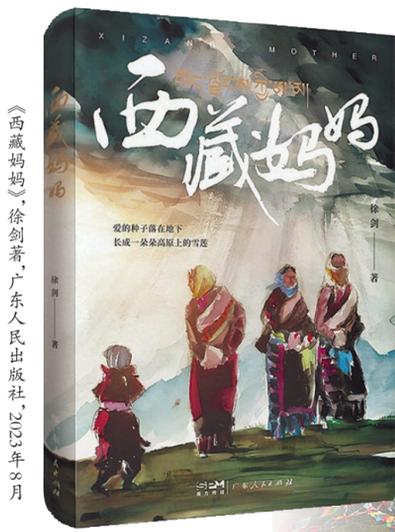
西藏是作家徐剑的精神故乡，《西藏妈妈》是作家徐剑献给精神故乡的深情之作。30年前，作为军人的他第一次进藏，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30年后的2022年，作为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剑已经第21次进入西藏。这片他所熟悉的广袤土地，已深深融入他的心灵，化为他文学创作的不懈资源。他一边行走，一边写作，展现着西藏丰厚的历史现实画卷。他笔下有英勇戍边的军人、忠于职守的警察、彪悍驰骋的牧民、辛勤劳作的农民、翻身解放的农奴后代、脱贫攻坚的乡村第一书记、援藏的青年干部、执着的科学家、治病救人的医生，还有神秘的僧侣、虔诚的朝圣者、猎奇的旅行者……而这次入藏，徐剑把目光聚焦在一群特殊职业的西藏女性身上，赋予她们一个温情的名字：西藏妈妈。

2013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了“双集中”供养的政策：县级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孤寡、病残的居民；地市一级的儿童福利院集中供养“失怙失恃”的孤儿弃儿，保障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权益。从作品反映出来的现实看，西藏一些地区，弃婴、孤儿现象比较突出。作家重点采访的昌都第二儿童福利院，就收养了1500多名孤儿，需要配套相当数量的“爱心妈妈”。拉萨市儿童福利院，本身收养的孤儿就不少，又接收了好几家解散的私人孤儿院的孩子，也要扩招“爱心妈妈”。那曲、林芝、阿里、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儿童福利院都需要增加“爱心妈妈”人数。昌都市民政局局长布措的一项工作，就是开车到各个乡村，寻找孤儿，“拾孩子”，带回福利院，为孩子们寻找“爱心妈妈”。政府采取集中供养是精准实施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举措，更与西藏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战略紧密相连，意义不同一般。报告文学《西藏妈妈》站在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高度上，讲述“爱心妈妈”们动人的故事。

开篇不久，作者就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动容的场面。哥哥希热尼玛和妹妹次旺拉措的单亲妈妈被狗熊撕去了半张脸，必须长期进行康复，无法抚养他们。兄妹俩被送到昌都第二儿童福利院，将由“爱心妈妈”们通过抓阄来获得抚养权。21号的“爱心妈妈”叫卡诺拉姆，她生了两个孩子交给奶奶带，自己到福利院带了7个孩子。她特别喜欢哥哥希热尼玛，抓到的纸条果然写着那个男孩的名字，激动得把孩子抱得紧紧的。23号“爱心妈妈”次仁拉姆是全福利院最漂亮的妈妈，才21岁，就能带9个孩子。她领养了妹妹，高兴得不行。作品写出了这两位“爱心妈妈”领到孩子时的喜悦心情，也写出了藏族妇女那种纯朴天然的爱。在两位妈妈的抚养下，兄妹俩的心情慢慢平复。一年以后，他们的母亲戴着面具来看望，发现孩子们把两位妈妈当作自己的母亲，幸福生活着。亲生妈妈内心特别痛苦，但也很放心。

格桑阿珍的27号家庭故事也很感人。格桑阿珍有当母亲的经验，她的家庭有10个孤儿。阿雄喇嘛也收养了4个孩子。但寺院长大的孩子上不了学，只有政府集中供养才能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因此，布局局长动员阿雄喇嘛把孩子们送到福利院。格桑阿珍领养了断了一条腿的3岁大的才旺尼布，还有一个叫才旺卓玛的女孩。阿雄喇嘛开始很不放心的，但看到格桑阿珍与孩子们的关系那样好，终于明白了，孩子们到福利院是来对了。

“爱心妈妈”当中，有很多“未生娘”，即没有生过孩子的姑娘。她们考上福利院之前，都没有带小儿的经验，靠着“爱心”，克服了许多困难，很快就成了合格的护理员、合格



《西藏妈妈》徐剑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在《西藏妈妈》里，徐剑突破原有理性表达的方式，有意使叙述更接近散文，更具抒情性，更具诗的意境。作者细腻地描写西藏高原特殊而又迷人的自然地理、长河大川、草原山地、村庄牧场、宗教文化，把风光风情风俗融进一个个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过程里，不猎奇、不传奇，只写真实，只写普通人

的妈妈。未生娘门拉，才到福利院半年，结婚不久刚怀上孕，就承担了把患淋巴瘤的孤儿小卓嘎送到成都华西医院的任务。从来没到过成都，人生地不熟，她租了个小屋子，每天背着病孩去挂号，排了半个月的队，才挂上了一个专家号。把孩子送进医院以后，她每天都要去照顾小卓嘎，干了几个月，福利院领导才派另外一个未生娘前来替换，后来又换了一个新的未生娘。三个未生娘没日没夜轮流护理，终于等来了奇迹——小卓嘎的病治好了。

福利院最难的工作是救护弃婴。孩子刚出生，如果没能及时发现，一个刚到世界的小生命，还没睁开眼就结束了。一旦发现弃婴，福利院就得紧急动员，用最快速度救治，找最好的护理员照顾。拉萨儿童福利院六号家庭的丹增拉巴就是这样一个被抢救的弃婴，而且是一个盲童。他比别的儿童活得更艰难，也因此得到“爱心妈妈”卓嘎更细心的照料。妈妈比谁都着急，带着他到处求医，还得到慈善机构的赞助，把丹增拉巴送到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诊断，盲童的眼疾目前不能医治，但可以通手术恢复一些视力。只是现在年纪太小了，还无法手术。卓嘎妈妈说等他再长大一点，一定要让他去手术，相信会有重见光明的一天。回到拉萨，妈妈每天抱着他，给他唱歌，直到他睡去。有一天，她突然看见，“丹增拉巴的眼睛里突然有一泓清泉流了出来”，那是孩子的泪水。

“爱心妈妈”被孩子们称为“度母”，就是天上的观音。她们当中许多人都有一些坎坷的人生经历，日子也过得不容易。然而，她们都不会因为个人困难放弃自己的责任，放弃自己的爱心。大曲宗以前在农村老家种青稞，供养四个侄儿侄女，直到成人。自己32岁了，还没谈上对象。她应招进了山南儿童福利院，找到了当妈妈的感觉，爱上了“爱心妈妈”这份职业。孩子们在学校受人歧视，说他们在福利院长大，没有妈妈，大曲宗就冲到学校对老师们说，我就是他

们的妈妈，不能让他们受其他孩子欺负。她总是替孩子们挡风遮雨，排忧解难。19岁的拥中卓玛在林芝有份稳定的好工作，有“一颗牧场上卓玛花一样纯洁的心”。一天，舅舅说，林芝儿童福利院正在扩招，我们家慈善积德的传统，你应该去报名。拥中卓玛听了舅舅的建议，也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应聘当了“爱心妈妈”，和四个孤儿组成家庭。孤儿拉措刚来时才两岁，“眼神惊慌，像一只小猫，头发缠成一团”，身上到处是虱子，也不跟人说话，拥中卓玛抱她睡了两个月，终于听到孤儿轻声叫：“阿妈拉。”嘎斯原是个草原放牧女，后到城市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几年后好不容易拿到了大专文凭，报考了昌都儿童福利院，成了福利院为数不多受教育程度高的“爱心妈妈”。她开始不习惯孩子叫她“妈给”，要孩子们叫阿姨或阿佳。她带的孩子年纪跨度较大，有的叫“妈给”，有的叫“阿佳”。她和孩子们建立感情后，也就不纠结了，一心要当好“爱心妈妈”。西藏“爱”的故事太多，每一个福利院都有讲不完的“爱”的故事。《西藏妈妈》一书由此升华为鲜明的思想主题：无论这些妈妈从哪里来，无论自己有什么人生，无论未来她们会怎样，现在集合在一起，用“爱”的力量托起了西藏儿童福利事业，也托出了西藏精神，无愧于“西藏妈妈”的称号。作家徐剑讲述西藏故事，总是带着一种感情，带着一种乡愁。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突破原有理性表达的方式，有意使叙述更接近散文，更具抒情性，更具诗的意境。作者细腻地描写西藏高原特殊而又迷人的自然地理、长河大川、草原山地、村庄牧场、宗教文化，把风光风情风俗融进一个个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过程里，不猎奇、不传奇，只写真实，只写普通人。天地相映，情景交融。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善良的人民，西藏大爱精神源于这片土地和人民。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田野志·洞庭”（《十月》2023年第2期）：云水深处见洞庭



读者视点

黄永玉《还有谁谁谁》：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背影

2023年6月13日，99岁的黄永玉因病逝世。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还有谁谁谁》出版前，当编辑和美编把样书送到黄老手里时，他曾说：“这本书出来，我终于可以睡好觉了。”读《还有谁谁谁》，一种千帆过尽自从容迎面而来。

故事易写，岁月难唱。13篇回忆故友之文，组成了黄永玉的最后一部散文集。《还有谁谁谁》沿袭《比老者的老头》中个人回忆史的写作脉络，记述了与多位故人相遇相交的过往岁月。翻卷书页，穿过流年的缝隙，我们看到了前辈贤士鲜为人知的一面，个人命运的浮沉与历史岁月的动荡在寥寥数语间交织。

黄永玉看重着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沈从文、萧乾和汪曾祺，也看重自己“写作者”的身份。“一辈子见过郑振铎先生三次。我记得他，他忘记了我。就像小林一茶先生的诗，这世界如露水般一样短暂。”《郑振铎先生》里，黄永玉就像是一个热衷于追星的小年轻，抱着鲜花任凭目光落寞地洒向远去明星的背影。正因为逐梦文学，在世间的的美好与丑恶、人生的幸福和苦难中，黄永玉也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为生命立传的文学自觉。《只此一家王世襄》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由衷折服”，他与王世襄先生的惺惺相惜令人深感震撼，高山流水的情义照拂是不可见的绝世风景；《让这段回忆抚慰我一切的忧伤》倾情书写黄家与香港《大公报》潘际坤、邹絮城夫妇肝胆相照的60年情谊……

“我坐在桌边写这篇回忆，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走在最后的一个是。”黄永玉深广的忧伤浓缩在一本书里，向世人昭示一个生命的百年沧桑，一部人的命运影像，一种情感的热烈与寂寥。在这一场“还有谁谁谁”的问答游戏中，谜底似乎就在谜面：只是我我我。黄永玉记录下他的真性情，就是在记录一种旷达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消散，一种属于一代人的精神质地的隐逸，也袒露着一个忧伤而狂野、独立而自由的世纪之魂。（胡胜盼，浙江省永嘉县桥头镇第七小学教师）

洞庭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在田野、在大地，她是万千子民赖以生存的鱼米之乡，在纸上、在心上，她是中华文脉的气质一种。《十月》杂志《田野志》栏目，叙述者身份各异，有作家、新闻记者、环保志愿者、纪录片导演，也有摄影家、画家。视角不同，所描述的洞庭亦各不相同。如此，洞庭除却既有的宏阔、美丽、神秘，新增了陌生、多义与复杂。沈念《铁方佛与船》里的洞庭丢了美丽标签，干旱的气候以及生态环境的人为损毁，导致湖区水域面积急剧缩小，“湖亦如人老”，是哀痛，是撕心裂肺之痛。那些庄重虔诚的造船仪式与民间祭祀风俗，是成为传说，还是得以传承？远去的船渔歌里，生长着烟火气息十足的洞庭，山水苍翠的洞庭。徐典波的《封面》耐人寻味。在梦境与现实不露痕迹的转换中，将人心与人性做了清晰异常的造影，令人生出梦耶非耶的恍惚。小说以开放式的姿态，任由读者去打开，去求索。其中人物的多义与复杂、人心与人性的纠缠，与沈念笔下呜咽啜食的“他”成为呼应，让我们看到洞庭的希望。毛晨雨的《新基建概念：麋鹿、共担、资本纪》传递出生态系统保护意识的前沿观念。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味求“多”的未来成本法，不过是原始掠夺主义“榨取我们现场/现实的身心空间以加速预命的塌缩方案”，是以加速透支我们的共同未来为代价的。蒋勇的《徙鸟几人》以鸟为线，串联起温暖人心的几个小故事。从事湿地保护工作的他，对洞庭

湖迁来徙往的鸟类如数家珍，随着他的讲述，我们了解了洞庭湖国际观鸟节、湿地保护、十年禁渔的众多细节，对人与自然的平衡修复有了更多的认识。王翔的《风行水上》以书画家的敏锐、情感与高超技法，将洞庭的性灵、开阔与舒朗跃然纸上，传递出笔墨之美，以及洞庭水哺育万物的品格与胸襟。

田野志是在场的行走与记录，体裁各异又异口同声，有合唱团的大气、磅礴。编者以洞庭为媒介，将摄影、写、评，集中到一个现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得文学感染力在这个特定空间，有了不同以往的传递与表达。（张维菊，山东省平邑县作协副秘书长）

安宁《草原十年》：绘就万物相依的画卷

作家安宁的长篇纪实散文集《草原十年》将目光投至风起云涌的呼伦贝尔，以一个叫做锡尼河西苏木的小镇为地理坐标，娓娓道来牧民生活在十年间的变迁历程。作为游牧文化空间的一位漫游者，安宁在与草原的接入、对话、融合中，捕捉到自然世界的丰富光影，绘就了一幅万物相依的共同体画卷。《草原十年》以一种亲切自然的风格，向读者展示直至真实的草原日常。阿妈一家人可谓是安宁草原生活的“向导”，带着她领略别样的民族风习。沉默的阿爸最喜爱的娱乐，是用收音机听乌力格尔，让安宁知晓了这种用蒙语表演的“古书”。暑假之时，安宁与家人去参加镇上

热热闹闹的升学宴，伴随着手把肉的缭绕香味，一首又一首的草原歌曲飘荡在呼伦贝尔上空，经久不散。正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相处中，安宁以一颗真诚善感的心，逐渐体悟到游牧民族的内在精神世界。面对病痛、死亡、孤独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小镇人以乐天、宽容的民族个性，用似草原一般开阔、纯净的胸怀，敞开了接纳了生命中所有的赠予。安宁如实记叙了草原上的人们与现代化相遇、碰撞之后的种种困境：曾经漆黑如墨汁的草原夜晚，有了灯光的闪烁；土墙房屋正在逐渐消失，被洋气美观的红砖房替代；手机、网络则让遥远、分散的牧民们跨越了距离的阻碍，密切地连接在一

起。有人对于传统草原生活有着执拗般的喜爱，也有人热切盼望进入草原以外的世界。尤为难得的是，安宁对于草原居民生活变迁的记述，并没有把自己的评判过多融入其中，而是以一种纳谏、尊重的态度，将人们的不同反应表现出来。草原也见证、参与了安宁的人生。十年之间，从爱情到婚姻，再到养育女儿，她的人和事和草原小镇早已紧密交织在一起。对于草原，对于天地，对于自然，安宁的情感是直接的，心是真挚的，因此少了曲折，少了宛转，少了铺垫，而是以直抒胸臆般的率真，用白描的方式描绘出美轮美奂的草原风景，在质朴中却蕴含动人的力量。（李蔚，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所助理研究员）